

聚焦文学新力量

小说的撞击之力与再生之美

□杨红莉

胡学文的小说极富力量感和穿透力,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将笔下的人物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呈现人与坚硬的现实之间的对撞,在对撞中把人心、人性展现出来。

近期的作品则使得他除原有的撞击之力以外,更增加了攀缘与交叉的再生之美——如大树之扎根沃土直指云霄,如藤之姿态葳蕤攀缘。

胡学文的小说多写实而少抽象,多叙述而少描写,沉静、冷峻、孤绝。胡学文的小说极富力量感,这种力量的生成或与作品的对象有关:他的小说多以坝上草原为背景,他触摸着这块广袤、荒寒的土地,感知着在这块贫瘠的滩涂上挣扎的人,探求着他们生存的本相,也叩问着人存在的真谛;或与他感知和叩问的方式有关: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将笔下的人物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呈现人与坚硬的现实之间的对撞,在对撞中把人心、人性展现出来。这样的“直截了当”使得胡学文的小说极富冲击力和穿透力,同时,这爆发的力更彰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碰撞之力

胡学文是讲故事的高手,所以作品大多“好看”。他尤其喜欢和擅长讲述“好人遭难”的故事。早期的小说如《极地胭脂》《飞翔的女人》《婚姻六位》等就呈现出这个特点,其后,《麦子的盖头》《逆水而行》《大风起兮》依然持续着这个模式,直到最近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胡学文始终未曾中断这一故事类型的讲述。《奔跑的月光》讲述做好事的宋河的遭遇。宋河为给进监狱的儿子减刑,找关系托门路,结果钱送出去了事没办成。宋河试图要回些钱,但是,钱未要回,却“捡”来一个傻子。富有同情心的宋河将傻子带回家中,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帮其寻找家人,终于将傻子交给“家人”后却发现所谓“家人”是假的,随后一拨又一拨“家人”相继来索要傻子,傻了眼的宋河一次次拿钱求得暂时解脱,小说最

后,宋河夜以继日地寻找傻子,负债累累、内外交困。好人难当,这似乎是当下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借助这篇小说,胡学文再次呈现一个好人做好事后的尴尬与困顿,再次呈现当下生活的扭曲与荒诞,呈现柔软的人心与坚硬的现实相碰撞后的种种可能。

为什么胡学文对这个故事类型情有独钟?我以为,这个故事类型体现着胡学文对于理想、现实的思考以及对于文学的认识。胡学文笔下的主人公多本分、善良,但是却恰恰因为本分、善良而陷入尴尬,走入绝境。与此同时,即使这些人走入绝境了,胡学文也并未止步,他依然执著地让这些人继续走下去。所以,胡学文笔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他们行为做事认死理,遇见挫折不认输,一条道儿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评论家将其称之为“执拗的主人公”,我以为可以称之为“一根筋”。无比困窘但依然一次次帮助傻子的宋河如此,不论怎样艰难始终坚持不放弃的女配种员唐英(《极地胭脂》)也是如此,不惜代价寻找女儿的荷子(《飞翔的女人》)、不计后果追寻尹小梅死亡真相的李响(《命案高悬》),不屈不挠要把坡地要回来的马达(《向阳坡》)等,都是这样的“一根筋”。他们按着自己认准的方式做事,不动摇、不妥协、不放弃,直至置身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直至和周围的整个世界为敌。至此,痛感骤然而生,力量感骤然而生。

胡学文笔下的现实如此坚硬残酷,或者说,胡学文将这些人物推向极端,同时也更尖锐地呈现出现实生活之滞重、残忍。《逆水而行》中的村长霍品对抗着乡长,想方设法地保护村民的利益,结果却成了乡长的眼中钉,也成了他所保护着的村民们的眼中钉——一个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独行者。但是,霍品依然逆水而行。坚持的艰难、生存的艰难、做人的艰难、理解的艰难,在此一一呈现。但是,也惟其艰难才更能凸显出浊重生活中卓然独立的精神,更能凸显这种执拗的宝贵。胡学文笔下的人物和他们所处的世界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关系:矛盾尖锐,盾便愈坚硬,二者相克相生。胡学文的写作就是一种一幅“蚍蜉撼大树”的图景,正是小人物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崇高的力量。震撼于此而生,美于此而生。

“国民性”之思

胡学文笔下执拗的“一根筋”与以往所熟知的乡民们的愚昧、顽固、保守、自私不同,甚至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执拗的“一根筋”们,在坚守着本分、守护着底线、彰显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精神,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服输、不怕累,终于一步步将村中的权力和财富统统集于一身,报了受辱之仇、夺妻之恨。但是,姚洞洞和坚硬的现实对抗的过程,分明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他对抗的是乡村坚硬的流氓集权制度,而他的获胜也无非是推倒了旧有而建构了新的同样的制度。在姚洞洞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历史惊人的内幕和惊人的循环。姚洞洞形象的丰富、立体,让我们看到胡学文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于乡村民众的熟悉,还看到他对于千百年来固囿乡村社会几千年的体制的洞察。

摇曳之姿

胡学文近几年的创作,尤其在中篇小说《从

《向阳坡》中的马达之所以要将坡地收回来,是因为他不认同“老板的狗就是比人值钱”的理论,坚守着人的尊严;《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那么执著地寻找丢失的女儿,宁可离婚、卖血、受辱,是因为她认为坏人做了坏事就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些人的执拗显然没有错。这些人身上的执拗、执著超乎常人,细细追问,究竟是所谓识时务的“正常人”错了,还是“一根筋”们错了?他们一心所要讨回或者坚守的不就是最基本的为人、为民之本么?他们所坚守的东西难道不是当下社会里最为缺失的吗?反观现实生活,当下社会缺少的正是坚守道德底线,坚持内心律令的人。所以,胡学文笔下执拗的“一根筋”们不是愚昧,而是执著的坚守;他们不是保守,而是义无反顾的反抗。胡学文的小小说一方面在表现残酷的现实,另一方面更着重于呈现那些执著的坚守之心,那些对残酷的现实说“不”的执拗之心。

而当胡学文着力发掘乡村底层民众的这种执著反抗时,他其实是在发掘中国民众身上的另一种“国民性”。这“国民性”有一个重要的积极内涵,那就是一种执拗的正直,一种面对流俗不妥协、不服输、不畏惧的精神,一种将“理”坚持到底的精神。胡学文对此进行了集中而充分的呈现;而当胡学文发现了底层民众身上的这种国民性的时候,也是在“重新发现‘人’”(周作人语):他重新发现了中国老百姓身上那种看似和愚昧很近但其实完全不同的精神质素,重新发现了一种一直在推动着我们民族向前行进的人的精神力量。我以为,这是胡学文所塑造的这一人物类型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其对当下现实精神建构的意义。

姚洞洞(《一棵树的成长方式》)是胡学文笔下的一个复杂的人物。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遭难的好人,也不仅仅是一个坚守着某种原则的“一根筋”,姚洞洞身上凝聚着更为复杂的因子:执著、倔强、狡黠、富有心机。他家穷被欺,母亲受辱,恋人移情,几近绝境。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服输、不怕累,终于一步步将村中的权力和财富统统集于一身,报了受辱之仇、夺妻之恨。但是,姚洞洞和坚硬的现实对抗的过程,分明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他对抗的是乡村坚硬的流氓集权制度,而他的获胜也无非是推倒了旧有而建构了新的同样的制度。在姚洞洞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历史惊人的内幕和惊人的循环。姚洞洞形象的丰富、立体,让我们看到胡学文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于乡村民众的熟悉,还看到他对于千百年来固囿乡村社会几千年的体制的洞察。

评 论

《万物生》:新农村建设需要什么

□宋家宏

《万物生》是沈洋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是他深入三甲村挂职体验生活后,历时一年创作的以新农村建设为题材的作品。

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沈洋已经具备了较为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云南昭通最艰苦的山区。文学创作多年,他的笔所书写的始终是乡村的人与事,他对乡村人与事的理解不是来自阅读,而是来自自己深切的体验。2010年起,沈洋再度深入到昭阳区永丰镇的三甲村,用他的话说是“成了那里的一个编外村民,成了一名泥腿子村干部,成了村民的邻居和朋友”。可以说,《万物生》这部长篇小说是沈洋长期的乡村生活积累映照的结果,它及时地反映了当下农村变革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显示了农村变革的必然性与发展趋向。

作家所了解、认识的生活要与他的内心情感发生共振才能写出有生活、有体验的作品。沈洋深入生活的选择是他创作的需要,更是他内心情感的需要。近年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是人际关系,都已经改变了,甚至在田间劳作的人也变成了零零散散的老弱妇幼,青壮年大多到城里打工去了。沈洋正是认识到了这一变化,才那么迫切地扎根于三甲村。如何建设新农村?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上至各级政府,下至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队员,应该给予农村、农民哪些切实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农民将面临一些什么样的矛盾与冲突,怎样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沈洋以他的长篇小说《万物生》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小说描写了市农业局干部文雅琪到鹤镇担任挂职副书记,推动苹果村

产业升级改造以及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故事,书写了滇东北一个乡村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的艰苦历程。小说揭开了当前三农工作中的复杂矛盾:许多农民对在土地上依靠耕种而改善自己的生活丧失了信心,热衷于进城打工挣钱。千百年来生机勃勃、给农村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土地荒芜了。苹果村产业升级,不仅涉及到传统思想意识的顽强抵触,更有已经获得利益的乡村大户不择手段的抗拒,用经济利益培植起带有黑恶色彩的家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乡村社会的发展。

小说以文雅琪与宗官员之间的冲突作为主要线索来展开情节。文雅琪的祖辈、父辈都曾任苹果村的工作队长,而宗官员一家三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斗。文雅琪再任苹果村的工作队长,必然带上了宗文两家冲突的色彩,而文雅琪和宗泽两人的一见倾心则使这一组矛盾更加复杂化。小说尤其可贵地写出了乡村民众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们虽然向往历史进步,渴望美好生活,也渴望改变自己家乡的落后面貌,但他们不可能天然地具备超越自己眼前利益的目光,更加重视的是眼前是否获利。小说中的宗官员深知这些民众的基本心理,施以小惠,充分调动了他们的力量,成为阻挠苹果村前进的力量。小说以苹果村为具体环境,试图映照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矛盾——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贿选、征地过程中开发商不顾人命关天的强拆、不顾及安全保障而发生的矿难等等,这些悲剧性事件也发生在小说中的苹果村,试图呈现当前中国农村生活的某些侧面。

面对如此复杂的乡村社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队应当怎样做?小说通过塑造工作队队长文雅琪的形象回答了这个问题。

小说中的文雅琪以她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眼光以及实干和富于牺牲的精神,为苹果村的发展勾画了蓝图,她克服艰难险阻,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最终获得了领导和村民们的信任,为苹果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这一形象与作家自己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沈洋深刻地体验了今天的中国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工作队。因而,这一形象有较多的理想化的色彩,性格也较为单一。

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得较为丰满且有深度的是宗官员。这个人聪明能干,有强烈的发财欲望,也有成为一方大户的梦想,但同时,他在其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可以不择手段。作家对他在不合理时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平作了间接的描写,使这一人物有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宗官员曾经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合理愿望,却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在今天又为自己一家的私利阻挠苹果村的社会进步,甚至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造成了灾难。这个人物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宗官员在深陷图囿之后终于醒悟,说明作家对这一人物仍然寄予了希望。

美中不足的是,《万物生》的矛盾冲突组织不够合理,结构线索的安排未能使小说呈现出波澜起伏的状态,有前轻后重之感。怎样以苹果庄园产业化推进为主线,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环环相扣地展开冲突,将读者吸引到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这方面作者显然努力不够。另外,小说已经呈现了很好的矛盾冲突,但是解决冲突的办法往往又过于简单,宣讲、语言的说服成为最重要的手段,这其实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冲突隐含的内容理解不够深入,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把握也有所不足。

■创作谈



□胡学文

对于写作者,阅读比写作重要,至少我是这样。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持续性的写作尤其需要阅读加油助力。每个人阅读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应该大体相同——尽可能地从文学作品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除此,还可能有意外的收获,阅读的乐趣也正在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被阅读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本身能提供什么。不可否认,同样的作品,优秀读者收获的远比普通读者多。也不可否认,空洞无物的作品,即便优秀读者也很难收获什么;而优秀的作品,普通读者的收获也可能超出预期。似乎太绕了,好吧,直接点说,一部作品能产生多大影响首要看作品本身能提供什么。

之所以这么绕,是不久前在一个场合听某人说,从美学的角度,《平凡的世界》完全可以割去。犹记得当时那人有些恢宏的手势,猛然一挥,仿佛他的手臂就是一把锋利的刀。我从不与人争论,而且我认为对于一部作品,读者有评价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但割去这个说法我还是很吃惊。什么是优秀作品,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标准。但我认为,相对恒定的标准也有,就小说而言,应有开闢丰稔的空间,这个空间有供阐释的可能。比如叙事学、美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就是说,从哪个方面都可以阐释,哪个方面都可以作为阅读的切入点。《红楼梦》是这样的小说,所以鲁迅先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若像割去《平凡的世界》那样,任何一部作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可以割去,即便割不掉,也割得千疮百孔,没有任何美感。

进一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不尽如人意,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割掉一部分。地球也必定伤痕累累,不复完整。老实说,我比较喜欢《平凡的世界》,虽然在写作上这部作品没有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但在人生成长的路上,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部作品给予我很多。文学的意义几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想是重要的,即让人活下去的力量。

当然,我在此无意评价更无意修正他人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我是想说,小说家的任务是尽可能拓展小说的空间,尽可能在那个空间里装些东西,使读者有更多阐释的可能。即使某些东西让人不适。能够引起不适,从某方面说,正是小说家的胜利。无关痛痒的小说有什么价值?适或不适,要视你由哪扇门进入。小说的魅力也在这里吧。